

《白狼歌》第十一句“倭让龙洞”试解

陈宗祥 邓文峰

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四年)三月,笮都夷白狼王唐菆在汉庭唱出三首颂歌。歌辞(1)中第十一句“蛮夷贫薄”的汉字音记“倭让龙洞”,以及第十五句“蛮夷所处”的音记“倭让反以”,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句子。王静如先生曾对“倭让”二字做过解释。(2)盖因这两句话涉及族属、历史、语言和考古等学科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目的就是论述“倭、让”两个族称,以期对《白狼歌》族属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让”(黑人)部落群体

普米语玉姆土话谓“黑”为nia,或作nie。他们称纳西族为nia mi,义为黑人。傈僳语谓黑为ne。凉山彝语为no。九龙、石棉等县的“罗汝”藏族部落成员称彝族为na-pa,义为黑人。(3)哈尼语谓黑为na,拉祜语为na,景颇(载瓦)语为no,藏文作nag,口语为na po。昌都地区藏族除有na po一说外,另称黑为mai po。宁蒗普米语称太阳为mi,藏语则称为ni ma。川西北地名米亚罗mie lo,甘孜藏语则称为nie lo。西夏语的“黑”字,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嘿”mai。但罗勒成则的《音同》字典不将此字列入重唇音一品,却入舌端音三品,当读为nia。由此可知,汉藏语系确有双唇鼻音m转读为舌面前鼻音n的对应规律。(4)nie,na等音实自mie,mai等音演化而来。

“让”,属上古阳部字。《广韵》作人样切,读近niang。白狼部落住牧地为“笮都”,它位于西汉设置的沈黎郡。沈黎确因公元前四世纪的“丹、犁”而得名。(5)犁、黎同音通作,与让字均是nie音的异写,具有黑人部落群体的意思。《笮都夷传》中有三个部落属于黑人部落群体。

1. 三襄 《后汉书·笮都夷传》说:“安帝永初元年(107),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又说:“延熹二年(159),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三襄部落的“三”字,《广韵》作苏甘切Sam。北京土话则读三为Sa。我们考虑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徙”称有关系,徙音斯,其古音读近Sie。唐人颜师古注:“徙后为徙县,属蜀郡”。其方位与三襄相同,同属蜀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订其地为徙阳县。王先谦说:徙县在雅州府天全县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记为“叟”。《常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叟,《广韵》作苏后切Sou,其古读仍与Sa音近似。由此可知,Sa部落分布地区是相当广阔的,四川、云南等省都有。

在普米族古谚语(冬比)中,也谈到“三襄”Sa nie这个部落。这条谚语说:

喀木山远住。

山近撒尼、蓬婆住，

我们这族人这个世界住。

意思说“喀木”（羌人）住在远山，撒尼、蓬婆住在近山，普米族则想占据这个世界。他们仅解释撒尼为蓬婆族的一支，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考虑“三襄”Sa-nie与云南的撒尼族或散民有关。《元史·地理志》的“徙马都”当为Sa-nie的另一异写。虽然没有直接自云南撒尼彝语与普米语姆土话中，证实Sa-nie含有黑人的意思。可是，凉山彝语称黑炭为Si，纳西族有部文献，书名为du ae Si ae。和志武同志译为《动苏大战》，du为白，Si为黑，实际意义应译为《黑白大战》，凉山州纳木义语的彝语借词称“黑彝”为Sa，(6)藏文称黑炭为Sol mdog，谓木炭为Sol wa，现今呼为So la，康方言称木炭为Siu，与彝语、纳西语显然是同源词。既可称炭，也含黑意。由此看来，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所记的“施”Si，“顺”Su等部落都是乌蛮，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今后讨论“虚恨”部落史时，尚需进一步加以阐明。

2. 污衍 “污”古读为u音，“衍”字古为喻母字，读近定母die。《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说的东蛮三部落的“勿邓”，也为u-die的音记。缅甸语称南诏王为udi-bhava，udi解释为武帝当然不妥，udi也可写作udan，我们认为与“勿邓”部落有关系，它正说明南诏王与勿邓同属乌蛮部落。(7)前已述及，《后汉书》说：污衍与三襄部落曾组成军事上的联盟，自今雅安专区起身，长途跋涉，远至今阿坝州的叠溪地区，支援当地部落，对东汉王朝的不法“长吏”进行斗争是事出有因的。我们检视明季《松藩边图》就可以瞭解叠溪附近确有很多黑人部落。(8)他们同属一个族系的亲属部落。否则，三襄与污衍不可能千里迢迢，不辞辛苦的跑到叠溪啊！

3. 施牛 “施”称当是黑mai的音记。《后汉书·邛都夷传》卷八六说：“安帝元初三年(116)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118)，以卷dia Kiwan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而《后汉书·安帝纪》作“施牛豪封离”。由此可知，“施牛”种就是“大牛”种，也就是黑人。与“大羊”（大牂）种恰恰是两个部落群体。

总之，《后汉书·邛都夷传》记载的“三襄”、“污衍”与“施牛”等部落，我们认为都是属于“让”（黑人）部落群体。再者，《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黎州诸蛮》项内，曾多次谈到弥羌与青羌，以及他们结成部落联盟的事迹。这都说明黎州地区确有黑人部落群体的存在了。

二、“倭”（白人）部落群体

《白狼歌》第11句“倭”字，疑指《后汉书·邛都夷传》的“楼簿”lo buak或lo buak。倭、楼同音，均为上古侯部字，音近lo。汉以后渐读入候韵，音近lou。汉语方音中有读“侯”入肴者，如现代粤方言把倭、楼读成lau音。因此，lau这一族称，有时写作楼或倭。

嘉戎藏语谓“白海螺”为Ko lok, tung Kar，雅江县与道孚县的“札巴”藏语谓“白海螺”为lo po，也具有白意。丹巴藏语则称lo，僭人（达让）称“白”为lio，九龙县与石棉县“罗汝”藏族谓“白”为lio，自称为lio Zu，意思是白海螺人或白人，色达县藏族

称白海螺为lie ou。我们也听到普米语谓白为lo的。(9)由此可证,僂、樓实为lo的音记,其意为白人。《后汉书·笮都夷传》内有五个部落属于白人部落群体。其中笮人与白狼业有说明,不再赘述(10)。这里仅探讨僂薄、槃木、奉通等三个部落于下:

1. 僂薄 这个部落分布地域是很广阔的,川西的民族走廊地区是他们的主要住牧地带。首先,从川西北部谈起,《常志》卷三《蜀志·汶山郡条》载“有六、夷、羌、胡、羌虜、白兰、峒、……九种之戎。”其中“六”字,《广韵》为力竹切lu,与樓lo音近似,理应单独点开。而刘宋范曄误认六字为数词,《后汉书·冉駹夷传》则记为“六夷、七羌、九氏”,共有二十二个部落。又误改“九种之戎”为“九氏”。但也有人肯定“六夷”之说,如《通鉴》卷八九胡三省注说:“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常志》的“夷”字本来是专指词,与“氐”音近,两字当属“同词异写”。而且《常志》早已提出胡、羌,仅与《胡注》三称相符,其余卯榫不合,难以令人信从。

1974年宝兴穆坪藏族老人,来西南民院探亲。他说磨坪土司隶属于天全六番招讨司,藏语称他为lo po rgyal—po。他势力强大时管到邛崃和泸定地区。由此可证,“六番”乃lo do另一音记,六字并非数词。

生息在川西的lo po人是很多的。不过另记为佬或僚字。南宋范成大在“淳熙丁酉(1177年)……,离成都”,赴永康军(今灌县灌口镇)。在他写的《吴船录》卷上说:“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后,皆西戎山矣。”又说:“壬申,泊青城山,……今日山后老人村,耆耄妇子辈,闻余至此,皆扶携来观,村去此不远,但过数绳桥,俗称其村曰獠泽,余以为不雅驯,更名老宅。”此处青城山后的西戎,实指僂(僚、老)人。他们在明季尚有活动,明人彭汝实《金声玉振集》说:“正德五年(1510)庚午,何卿征流贼……,值各蛮劫安、绵,警连大印。落魄蛮围坝底城二旬,卿出奇破之,又报捷于土门。”(11)坝底在今阿坝州茂汶羌族自治县东部。此处“落魄”实为lo po部落的异写了。

繁衍、生息于汶山郡南邻的汉嘉郡地区的僂薄部落的后裔很多,但均记为僚字。《北史·獠传》说:“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关于此地的僚在史籍就有多条记载。《南史》卷三九《刘勰传》附其子《刘悛传》说:“永明八年(490),悛启武帝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秦之严道县地。青衣县,文帝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处。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由此可知,青衣县即汉嘉县,今芦山县芦阳镇。严道县在今荥经县西,均为僚人住牧之地,其方位恰与僂薄吻合。此外,南齐(公元479—502年)时,于僚人聚居之地,均改置僚郡。在原有郡名中增添一僚字,如:沈黎僚郡、越西僚郡。

前已有人根据明代田汝成《行边纪闻》的“猺獠一曰獠;和他的《炎徼纪闻》所说的“猺獠一曰猺獠”,试证僚就是佬佬Ka lau或Ka lo。(12)由此可知,僂薄与佬佬关系密切。有关这方面资料相当丰富。《隋书·附国传》卷八三说:“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而在《新唐书·南蛮列传下》卷二二下却记为“嘉梁”,该传说:“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皆诸蛮错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四百余里之外有……林波……。五百余里之外有……东嘉梁、西嘉梁……。”

嘉良、嘉梁均为Ka loK的音记。学者们认为即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四土和宝兴县的嘉戎藏族。他们自称Ka ru pó或Ka ru Ká。马长寿先生考订楼薄为ru pú的音记。(13)Ka ru或即仡佬的变读。《新唐书》所记的“林波”或为lo po另一音记。此外，在李德裕《又论杜元颖追赠第二状》中说：南诏俘虏很多人赴大理，“其八千九百余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杂獠獠。”(14)这就确凿的证明黎、雅等州确有僚人和仡佬族了。

越西郡地区也分布有楼薄部落的。唐樊绰《蛮书·名类第四》云：“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其中“雷”字，《广韵》作鲁国切，念作luai，与僚音近似。此处所记的雷蛮确指冕宁县东西散居的lo po。1900年英国人H·R·戴维斯在冕宁锦屏山西侧遇见楼薄部落成员。(15)据彝族冯元蔚同志见告，西昌礼州坝河堡子附近的桥顶山上，尚有多户自称“楼普毅毅”的居民。彝族称他们为“普苏”，疑他们就是“楼薄”部落的后裔。此地西番长期与彝族相处，他们会说一口流利的彝话，妇女们头缠铜圈形大头帕，着麻布裙子。男子着麻布裤子，仍保留本族服饰的特点。

此外，在木里县东境与九龙、冕宁两县接壤地区，在雅砻江西侧有个保波公社。木里县政协吴老先生说该地有三个很大的寨子，居民的语言和习俗与普米族完全相同。当地纳西族依称他们为楼薄。由此可知，楼薄确与普米族有亲属关系。

根据以上大量资料充分证明“楼薄”确指“白人”的。但是也存在着难于解决的问题。从民族学观点来说，普米（白人）、大理白族与湘、滇、黔的仡佬族为亲属民族。但是，从语言学的资料来看，白族语言列入彝语支，(16)与我们提出的族系互相抵牾。最难的是川、黔、湘、滇的仡佬语言系属至今未定。解放前一九四〇年、四一年，德国人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女士曾至安顺及其邻县进行调查。一九四五年，她又去贵州镇宁、朗岱等县调查。她调查了仡佬族五个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说一种方言。(17)此后，她长期在台湾省民族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没有看到她有关仡佬语研究的文章。解放前成都燕京大学李方桂先生曾送陈叔永同志（现在北京大学任教）赴贵州调查仡佬语。他的报告（英文）说：“有些词和侗傣语族的语言接近，有些词和苗瑶语族的语言接近，但又显然和苗语是不同的语言。从前有人把它列为侗傣语族的“佬语支”或“僚语支”，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才能决定。”(18)近年来有些同志在仡佬语方面作着艰辛的探索，令人欣然起敬。今后我们也计划写出lo po部落在滇、黔、川东历史的分布情况，为探讨仡佬族的族系问题略尽绵薄之力。

2. 槃木 《后汉书·南蛮夷传》提出的“槃木”疑为普米pár mi的音记，也是属于白人部落群体的。《三国志·蜀志·张疑传》与《华阳国志·蜀志》都谈到了“定笮率豪狼岑，笮木王舅”。晋·常璩《华阳国志》则以“白摩沙夷”代替了“笮”人，当然令人考虑笮人也就是“白摩沙夷”。此处“白”是个关键字，是少不了的。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改为曰字，这是错误的。常璩何以记为“白摩沙夷”呢？我们揣想有两种可能：他以比较习知的摩沙夷作为同一方位各族的通称，但冠一“白”字以别之。或误听槃木为白摩沙，“沙”为衍文。前者可能性要大些。

槃木与《史记》所说的“白马”有密切关系。《后汉书》记载的《白马氏》说：“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居于河池，一名仇池。”这是说白马氏住牧在成州上禄县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也说：“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氏，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白马部落不但分布在甘南，也住牧在四川西部。正如《后汉书·西羌

传》所说：“戎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又说：“旄牛、白马在蜀汉，……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不过，在宋代关于川西黎、雅等州的白马部落，不记为“白马氏”，而记为“白马丹”。(19)“氏”古读tai，可转读为tan。氏、丹实为一声之转。普米族自称为白人，有时也自称“丹”或“土米”，其意义是“海螺”或“白色”。再检视明季《松潘边图》，其中标明白马确为白人。勿庸置疑，白马或槃木确为白人。

3. 奉通 《后汉书·笮都夷传》说：（安帝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贡黄金，旄牛牦，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奉通”古读为bong Tung。普米族老人说，他们古代的祖先的确有个bong-ta部落，至于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迹，他完全说不清楚了。

总之，通过笮人、白狼、槃木、楼薄……等部落的阐述，我们认为川西地区是有白人部落群体的。就以黎州来说，《宋史·蛮夷四》称：“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白蛮，在州东南一百里”，那就确证该地有“白人”部落了。

三、“龙洞”的意义

普米语long Stong，义为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很贫困，乃一惯用词语，现在该族人民仍然这么说。Long Stong与“龙洞”Liwong dong(don)相当。Long与Liwong声母和主要元音相同，只是开合有异。汉代以后汉语无疑没有复辅音声母，故记音者只得略去S一音而以dong(dong)（汉字作洞）对译Stong，取其韵母相同而已。

总之，把“傻让龙洞”Lo nia long Stong整句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们白、黑部落群体是很贫困的”。从下文“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土地垓垓”等歌辞来看，他们的确是很贫困的，但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族人民早已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一起过着共同繁荣幸福的美好生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注：

(1)《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有明确的记载：“（永平十七年三月），西南夷哀牢、僰耳、徼徕、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据此，把白狼王唐最一行赴洛，订为公元后七十四年。

(2)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第一集，1930年北京出版。

(3)陈宗祥《川西“罗汝”藏族部落初步调查》。

(4)：闻宥《汉藏语族中m>n之演化》，《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

(5)陈宗祥《〈史记〉“丹、犁臣蜀”试析》，油印本。

(6)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报》，1983年出版。

（下转83页）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再探索

李 连

引 言

考古学上的分期、断代,其目的在于排列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序列,从而复原古代社会面貌及人们生活和生产情况。本文将根据大石墓发掘清理的情况,来考察其使用民族的迁徙移动方向。

安宁河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发源于冕宁县,全长大约350公里,自北向南流经冕宁、西昌、德昌、米易等县,至弯滩流入雅砻江。安宁河的支流短小水急,呈羽毛状,均匀分布,干支流两岸有很多的河谷平原,形成连珠状小盆地。因此,安宁河流域自古就是一些农耕民族的栖息之地,同时又是南北民族交往和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在这条通道上分布的大石墓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中一种典型而又特殊的墓葬,因墓室多采用大型石块构筑而得名。

一、喜德与米易的大石墓

喜德县位于安宁河上游。该县发现的大石墓在目前所发现的大石墓中,是安宁河流域最北地点之一。该县发现的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喜德河沿岸,如在上游的拉克公社,下游的冕山公社、深沟公社均有发现。一九七六年喜德拉克公社清理了保存较为完整的大石墓五座^①,出土器物有:1.生产工具十九件,包括石凿、石镞、铜镞、陶纺轮、铜刀、骨锥等;2.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包括单耳罐、双耳罐、带流壶、三耳壶、斜肩罐、陶杯、陶釜;3.装饰品有铜铁制的各种饰物以及玉、石、人工烧制的佩珠等,数量甚多;4.另外还有铜钱五枚。清理报告将这些墓葬分为三个类型,并认为ⅠⅡ类型的大石墓过去在西昌曾经清理过几座类似的,而第Ⅲ类型则是首次发现。这三种类型的墓葬,均用大石块建筑,同为二次丛葬,出土器物属同一系统,且处于同一基地的各墓排列整齐,应该是同一民族的墓葬。Ⅱ类墓出土文帝四铢半两,属西汉前期;Ⅲ类墓结构较为复杂,出宣帝五铢,时代应属西汉后期。

我们认为喜德县的大石墓应自成一组,并且是大石墓中时代最晚的一组。喜德县所谓的Ⅰ类墓较西昌地区的Ⅰ类墓为晚,因出有铁器。一九八四年四月,喜德县拉克公社境内的第二次发掘清理工作又提供了新证据^②。 M_1 号墓的出土物有:条形石器、单耳陶罐、鎏金大铜环、鎏金小铜环、鎏金铜泡钉、环饰、铜铃、铜扣饰、铜发饰、铜鬲、铁刀等,还有铜钱二枚,内有“五铢”和“大泉五十”。报告者说:这次清理的 M_1 号墓,其形制虽与西昌坝河堡子 M_1 号墓(Ⅱ类型)、喜德拉克 M_1 号墓(Ⅱ类型)相近,但从出土器物看,它却是现已清理的大石墓中,有明确断代依据可考的时代最晚的墓葬,可能到东汉初年。